

## 演化经济学:第三种经济学体系的综合与创新

贾根良

(中国人民大学 经济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目前,在独立自主的发展上,演化经济学受到了西方主流经济传统思维模式的很大干扰,能否保持其独立的研究纲领是当前演化经济学发展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从经济思想史上追根溯源,演化经济学实际上属于源远流长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异端经济研究传统。它是一种独立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所具有的共同基础和对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的普遍赞同,为其演化经济学的综合与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基础。演化经济学综合的目的为了避免其研究者作茧自缚,局限于狭小的主题范围,同时也是为了系统地建构演化经济学的知识体系,克服目前演化经济学理论研究难以深化和不利于对经验研究的协调等弊端。演化经济学与经济思想史上源远流长的国家主义经济学之间存在着深远的渊源,演化经济学对其综合具有客观基础,综合的目的是为了创建以国家崛起和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中国国家主义经济学。

**[关键词]**演化经济学 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 异端经济学 国家主义经济学

**[作者简介]**贾根良(1962—),男,河北省蠡县人,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演化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11)06-0063-08

自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现代演化经济学在国际学术界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在最近几年,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不仅在重大的经济理论上出现创新乏力的迹象,而且在独立自主的发展上,也受到了西方主流经济学传统思维模式的很大干扰。演化经济学的未来发展将何去何从?本文在简要地评述演化经济学所面临的挑战后,拟通过对西方经济思想史的简要考察,论述现代演化经济学作为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为什么可以通过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异端经济研究传统的广泛

综合而得到发展。然后,讨论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综合设想及其对演化经济学创新的推动作用。

## 一、演化经济学处在十字路口上

对经济学专业人士来说,人们都知道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是经济学的专业基础课,但实际上,政治经济学讲授的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作为演化经济学主体组成部分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

异端(政治)经济学诸流派并没有被纳入其中<sup>①</sup>；而西方经济学讲授的只是新古典经济学体系，虽然演化经济学也属于西方经济学，但却无法被包含于其中。在现行中国经济学教育体系下，除了极少数大学开设有演化经济学研究生课程外，绝大多数大学的经济学院对演化经济学几乎没有任何介绍，仍有相当多的经济学教授和经济学专业毕业的博士对演化经济学颇感陌生。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演化经济学被介绍到中国已逾十年、出版了两套译丛、办有专业杂志《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并召开了三届“中国演化经济学年会”，但笔者在近几年却发现，有相当多的作者仍运用属于新古典经济学体系的新制度经济学和演化博弈论来理解演化经济学，还有相当多的学者把承继新古典经济学科学主义思维的复杂性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看作是演化经济学的组成部分。因此，笔者对这种状况颇感担忧，担心它被新古典经济学体系所袭取，断送演化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远大前程。

笔者的这种担忧并非杞人忧天，在欧洲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及其会刊《制度经济学研究》和美国演化经济学学会及其会刊《经济问题杂志》拒绝数学形式主义并保持其独立性的同时，作为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标志性特征，数学形式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支配了日本演化经济学协会，而数学模型在国际熊彼特学会的《演化经济学杂志》上也日益增多，即使它们现在还没有变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附庸，但演化经济学的宗旨和独立的研究纲领却日益模糊不清。纳尔逊和温特在1982年出版的《经济变迁的演化理论》标志着演化经济学的复兴，但在事隔二十多年之后的今天，演化经济学却处在了十字路口上，它将何去何从？这个问题不仅对学术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具有重大影响，而且对演化经济学自身的发展也至关重要。我们知道，多样性是创新和演化的基础，这是演化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演化经济学的发展不仅刺激了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吸收其新思想，而且也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新。如果演化经济学丧失了其独立性，它不仅在推动经济学创新上的作用就会消失，而且它还将丧失其自身作为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在中国创造性发展的历史机遇。

国外最近的一些研究也证实了笔者的这种担忧。德国演化经济学界的元老乌尔里希·维特通过同行调查的方法评价了演化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前景，他把凡勃伦(老制度学派)、乔治斯库一罗金、哈耶克和诺斯等人所代表的研究方法称作自然主义学派，调查了教授和年轻学者们对新熊彼特学派、自然主义学派和形式化工具感兴趣的程度，其结论是：在问卷调查中表现出来的对过去成就的全面排序中，新熊彼特主义的立场最为突出；而对未来有前途的研究的评价中，几乎没有证据表明自然主义学派被演化经济学所接纳，或者对这种方法的兴趣真正有复苏。似乎得到支持的是在形式化模型和相应的工具上的兴趣(“基于主体的建模工具和计算方法”，“网络模型”，“复杂经济动态学”)。特别是在年轻学者对“最有前途的新发展”的关键词评价上，虽然传统的主题“产业演化和生命周期”和“制度方面的整合”仍名列第一，但演化博弈论和基于主体的计算方法名列第二。<sup>②</sup> 希尔瓦和泰泽拉通过对1969—2005年间在杂志上发表的带有关键词“演化”的文章进行分析，得出如下发现：“经济思想史和方法论”占29.0%，“博弈论”占18.4%，被认为发展滞后的形式化模型论文占1.8%，而在1992—2005年间纯粹经验研究的论文只占7%。<sup>③</sup> 乌尔里希·维特对这种状况心存担忧，在他看来，只有建立在自然主义世界观基础之上的演化经济学，才能在实质上挑战以牛顿主义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然而，自然主义学派在今天的演化经济学中似乎并未产生太多的共鸣。

演化经济学目前的这种困境可以在其复兴过程中所存在的先天不足中被发现。例如，美国老

①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经济学的发展明显地分裂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和异端经济学两大阵营，而西方异端经济学又由马克思主义西方异端经济学流派和非马克思主义西方异端经济学流派所构成。在奥哈诺1999年主编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百科全书》中，所谓古典经济学解体后的政治经济学除了马克思主义西方异端经济学流派外，还囊括了非马克思主义西方异端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但把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排除在外了。

② [德]乌尔里希·维特：《演化经济学具体是什么》，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2010(6)。

③ Sandra Tavares Silva, Aurora A. C. Teixeira, "On the divergence of evolutionary research paths in the past fifty years: a comprehensive bibliometric account",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19(5), October, 2009, pp. 605-642.

制度学派创始人凡伯伦是演化经济学这一概念的创造者和研究纲领的奠基者之一,但纳尔逊和温特在他们1982年的著作中却完全没有提到凡伯伦,虽然纳尔逊在后来补救了这个失误。又如,演化经济学在1987年就正式提出了对许多国家包括我国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重大影响的国家创新体系概念,但只是在后来,这个概念与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之间的联系才被人们所了解;而直到近十年来,国家创新体系与欠发达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才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这些例子说明,现代演化经济学对自身的身世并不明了,从而对演化经济学的性质产生了混乱的认识,其原因就在于它没有明确地把其研究纲领与经济思想史上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联系起来。正如著名物理学家彭加勒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物理学大革命中所指出的:为了预见数学的未来,正确的方法是研究它的历史和现状。

## 二、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综合: 经济思想史的透视

长期以来,演化经济学家们就对演化经济学缺乏一个系统的知识体系而苦恼,与此相关,他们对演化经济学所包括的范围也存在着争议。在前述乌尔里希·维特的眼中,演化经济学包括了新熊彼特学派、老制度学派、演化博弈论和乔治斯库一罗金、哈耶克和诺斯等学者的学说。霍奇逊在1999年指出,至少有六支文献使用“演化”这个术语: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斯密、马克思和马歇尔这些思想史上的大家,演化博弈论和复杂系统理论<sup>①</sup>,但在2010年的论文中,他却并没有提到复杂系统理论。<sup>②</sup>而据多普菲和波茨对演化经济学涵盖范围的广义描述,我们可以把其分为三类:首先是目前西方经济学的异端经济学流派,其次是由有机的、系统的和动态的现代宇宙观在自然科学中产生的新理论,如演化理论、自组织理论乃至复杂系统理论等,最后是数学方法如演化博弈论和基于主体的计算方法等。<sup>③</sup>

演化经济学的这种状态对其思想的传播、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多普菲和波茨指出,虽然演化经济学作为诸多理论和方法的结合使自身具有不断增加新奇的科学知识的优势,但是,这种庞杂状态极大地阻碍了理论研究的

深化,也不利于对其经验研究的协调。在笔者看来,演化经济学的这种跨学科性与开放性特征固然有利于吸收自然科学的新思想和新方法,但对于产生一种整合性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却产生了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笔者在2002年就提出了演化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问题。<sup>④</sup>虽然有学者指出,由于目前的大量理论争论,演化经济学不可能趋同于一种整合的方法,但多普菲和波茨2008年在这种综合上已经作出了尝试。<sup>⑤</sup>实际上,波茨在2000年出版并于当年获“熊彼特奖”的《新的演化微观经济学》就是这种综合的较早尝试。波茨在该书中指出,所有异端经济学的核心都是系统,他们可以在系统论这个基本分析框架下,通过“连接”(connections)这个关键性概念统一起来,通过这个概念,对异端经济学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避免迷失在各种学派令人困惑的不同概念、不同理论的迷宫之中,这就是新的演化经济学。系统是由要素和要素之间的连接两方面构成的,连接是要素之间的联系和交互作用,演化经济学研究的是要素之间的连接,而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研究的则是要素,这是两者在研究纲领上的基本区别。<sup>⑥</sup>

笔者认为,波茨把系统论作为演化经济学综合的基础确实抓住了事物的本质,因为系统论和原子论不仅是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异端经济学与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在其理论体系上产生根本性分歧的哲学基础之所在,而且也是西方经济思想史中之所以出现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的根本原因之一。自文

① Hodgson, G. (1999), *Evolution and Institutions*.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② Hodgson, G. (2010),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on Contemporary Evolutionary Economics*. The Papers on Economics and Evolution are edited by the Evolutionary Economics Group, MPI Jena.

③ Dopfer, Kurt and Potts, Jason (2004), "Evolutionary realism: a new ontology for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 11(2): 95-212.

④ 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与创造性综合》,载《学术月刊》,2002(12)。

⑤ Dopfer, Kurt and (2008), *The General Theory of Economic Evolu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⑥ Potts, Jason (2000), *The New Evolutionary Microeconomics: Complexity, Competence and Adaptive Behaviour*. Edward Elgar.

文艺复兴以来,在西方经济思想史中就形成了由两种不同的世界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的经济学研究传统:一种是从重商主义、美国学派、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经济学、老制度学派和熊彼特经济学等一直到目前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异端经济学所构成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以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的西方经济学研究传统;而另一种则是从重农主义、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庸俗经济学”和杰文斯—瓦尔拉斯的边际革命等一直到现代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是一种以静态的、原子论的和机械的宇宙观作为其哲学基础的、在目前被称之为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传统。这一分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愈发清晰,两种传统在现代西方经济学界已经明显地分化为西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和西方异端经济学两大阵营,而在西方异端经济学这一阵营中,又被划分为马克思主义的和非马克思主义的。那么,西方经济学在两大经济学研究传统之下是否存在三大经济学体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和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异端经济学呢?在前两者具有高度统一的分析框架的同时,后者则处于相对分裂的状态,那么,后者是否具有共同的基础,从而可以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行演化经济学的综合呢?

笔者在已经出版的著作中讨论了现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异端经济学诸流派的许多共同之处,<sup>①</sup>简单地讲,他们在以下方面所具有的共同特征可以使之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进行演化经济学的现代综合。首先,在从重商主义一直到现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异端经济学所构成的研究传统中,贯穿着一种与现代宇宙观相一致的、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正是这种世界观构成了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其次,在从德国历史学派以降的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异端经济学传统中,除奥地利学派外,他们在理论内核上都明显地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个人主义—均衡的分析思路相对立,赞成制度—历史—社会结构的分析框架,现代演化经济学在这一点上也是与其相一致的。再次,与现代演化经济学把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作为其科学哲学基础一样,现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异端经济学的主要流派如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奥地利学派、后凯恩斯主义

经济学、女性主义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调节学派等也都明确地赞同这种科学哲学基础。我们在《西方异端经济学主要流派研究》一书中已经就批判实在论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异端经济学的综合问题进行了专门的讨论。最后,除新熊彼特学派对经济学的数学形式主义持妥协态度外,西方经济思想史中的非马克思主义异端经济学传统都坚决反对数学方法在经济学的过度使用,致力于发展一种替代性的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此外,经济思想史上的美国学派、德国历史学派<sup>②</sup>和马克思经济学等都是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先驱。因此,笔者曾提出,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异端经济学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独立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并通过演化经济学的现代综合而得到发展,<sup>③</sup>我们可以把其称作是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综合。

### 三、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综合 如何推动演化经济学的发展

现代演化经济学可以通过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异端经济学传统的综合,作为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而得到进一步发展。针对本文所提出的这种观点,人们有可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综合的目的何在?我们知道,在西方演化经济学界,人们一般只把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异端经济学中的老制度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和奥地利学派包括于其中,对此,笔者在2004年的著作中增添了马克思主义的调节学派,提出了“四学派”划分法。在该书刚出版后,笔者就感到这种划分不妥,认为应该把西方非马克思主义所有异端经济学派都作为演化经济学综合的对象,但一直没有写文章加以阐述。笔者的“四学派”划分法得到了国内一些学者的认可,但也因此对人们思考演化经济学的综合问题产生了一些限制。例如,由于没有把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包括在演化经济学的流派中,人们就注意不到,该学派所发展的价格、货币金融、收入分配、就业和宏观经济等诸多理论与演化经济

① 贾根良等:《西方异端经济学主要流派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② 贾根良、黄阳华:《施穆勒纲领与演化经济学的起源》,载《南开学报》,2007(4)。

③ 贾根良:《“新经济思想史”刍议》,载《社会科学战线》,2010(1)。

学研究纲领的相容性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如果把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包括在演化经济学的流派中,综合老制度主义、奥地利学派和新熊彼特学派的价格理论或思想,杨虎涛教授有可能不会认为演化经济学缺乏价格理论了,也就不会认为这构成演化经济学综合的障碍了。<sup>①</sup>

因此,笔者认为,把现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异端经济学的所有流派及其经济思想史上的所谓“异端”经济思想作为综合的对象,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避免演化经济学的研究者作茧自缚,局限于狭小的主题范围。虽然在进入 21 世纪后,演化经济学的研究领域已经迅速在扩展,目前已经形成了演化发展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地理学<sup>②</sup>这样专门的研究分支,但是一直到目前为止,演化经济学界由于研究队伍的弱小,因此往往集中于某些主题,虽然在这些主题上如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上取得了突出的成绩,但对其他主题的忽视对于形成一种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相比肩的系统知识体系却造成了不利影响。例如,乌尔里希·维特在前述论文中,针对新熊彼特学派在演化经济学中一枝独大的状况,呼吁演化经济学界要超越基本上是经典产业经济学理论和技术变革理论的竞争者这样的新熊彼特主义论题,使长期发展、文化和制度演化、生产、消费、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这些主题回归演化经济学研究的议题。而一旦关注这些更广泛的主题,我们就有可能发现,许多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异端经济学传统的研究成果虽然没有使用“演化”术语,但经过“演化”范式的整合和创新,就可以整合到演化经济学的知识体系中,从而推动演化经济学相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例如,杨格定理、货币国定论、金融不稳定学说和产业价值链分析等,由于都属于系统论和历史分析而不能纳入到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但完全可以融入演化经济学的知识体系之中。

把现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异端经济学的所有流派及其经济思想史上的所谓“异端”经济思想作为综合对象的第二个目的是为了扩大目前演化经济学综合的范围,建构演化经济学有关经济世界的系统的知识体系,具体地说,就是按照多普菲、波茨和福斯特提出的“微观—中观—宏观”经济学体系,撰写一套适合于大学本科生教学的教科书。

而建构这样的知识体系或撰写教科书,基本上只能来自具体的经济学知识或理论。在前述我们对多普菲和波茨有关演化经济学涵盖范围的广义描述的分类中,只有他们提到的异端经济学流派才能提供这种具体的经济学知识或理论。虽然现代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异端经济学诸流派及其在经济思想史上的所谓“异端”经济思想在研究主题或研究领域上有许多重叠,但它们对复杂经济系统不同侧面的研究各有所长,如老制度学派在制度、“新熊彼特”学派在技术、奥地利学派在市场过程理论、后凯恩斯主义在货币金融和宏观经济学、调节学派在后福特制主义、女性主义经济学在种族和性别等等,它们在这些问题的研究上都有突出的学术建树。此外,博尔丁<sup>③</sup>和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金还开创了演化生态经济学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因而可以综合成一种更全面地研究复杂经济系统的经济学体系。这种综合可以有效地推动演化经济学的传播,克服目前演化经济学理论研究难以深化和不利于对经验研究的协调等弊端。

针对本文所提出的演化经济学综合问题,人们可能还会马上联想到这种综合如何回应西方演化经济学界在其分析框架上的争论:选择达尔文主义经典的“遗传、变异和选择”框架还是自组织理论的框架?生物学类比在演化经济学的早期发展中曾经起到重要的作用,虽然彭罗丝早在 1952 年就对经济学中的生物学类比提出了批评,但达尔文主义一直是演化分析的基本框架。然而,著名演化经济学家乌尔里希·维特和福斯特<sup>④</sup> 1997 年在同一期杂志上同时对此又提出了挑战,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提出用自组织理论替代达尔文主义。在他们看来,“自组织理论……为演化过程提

① 杨虎涛:《演化经济学——无序态及其整合》,载《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5)。

② Boschma, Ron and Martin, Ron (2010), *The Handbook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 Edward Elgar. 有关演化经济地理学的中文文献可参看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刘志高博士的相关论著,他是国内在该领域的代表人物。

③ 博尔丁于 1966 年提出了生态经济学这个概念。

④ Foster, J., *The Analytical Foundations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From Biological Analogy to Economic Self-organisation,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1997, 8, pp. 427-451.

供了一种抽象的和一般的描述”。<sup>①</sup> 这种观点引起了霍奇逊等人的回应,从而在演化经济学界引起了一场争论。目前,达尔文主义的经典分析框架仍得到了较普遍地接受,霍奇逊指出,达尔文主义具有独立于其应用领域的内在逻辑,它为多层次的演化过程提供了一般框架。<sup>②</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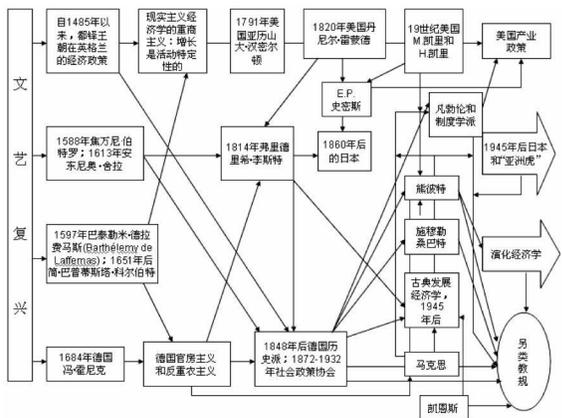
但是,演化经济学的现代综合是否必须遵循“遗传、变异和选择”的经典分析框架呢?遵循这种框架是否会造成不必要的限制和束缚?笔者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是否有可能超越达尔文主义“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从达尔文革命更广泛的哲学意义上,构建演化经济学的概念体系?<sup>③</sup> 在这方面,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借鉴: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是模仿经典物理学建立起来的,但人们几乎注意不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因此,笔者建议,在演化经济学的初步综合上,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限制和束缚,可以不遵循“遗传、变异和选择”的经典分析框架或者至少不要严格地遵循这种框架,只要某种具体的经济理论符合动态的、系统的和有机的世界观,就可以被整合到演化经济学之中,在编写出由演化微观经济学、演化中观经济学和演化宏观经济学所组成的演化经济学的基本教科书之后,在此基础上再逐步精炼和创新演化经济学的分析框架。

#### 四、中国演化经济学的特殊历史任务

作为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综合,中国演化经济学的发展还必须综合经济思想史上的重商主义经济学、美国学派以及德国历史学派(包括李斯特经济学)的重要洞见,使其成为中国演化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重要来源。这种综合的原因并不仅在于美国学派和德国历史学派是演化经济学的重要先驱,也不仅在于德国历史学派是演化经济学的比较和历史研究方法的正式开端,更主要的原因则在于这些经济学说是分别指导英国、美国和德国从欠发达经济(发展中经济)走向国家崛起的国家主义经济学<sup>④</sup>,对于在较长时期内仍处于欠发达经济状态的当代中国来说,这些学说比一般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具有更直接的重大借鉴价值。笔者在前面已经谈到,国家创新体系的概念与李斯特经济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渊源,伦德瓦尔指出,弗里曼早在

1983—1984年就已完成但并没有发表的论文《技术基础设施与国际竞争力》<sup>⑤</sup>是第一篇使用国家创新体系概念的论文。从弗里曼的论文来看,国家创新体系概念的提出实际上深受李斯特的影响,作为德国原始历史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李斯特<sup>⑥</sup>却又是第一代美国学派的一名主要成员<sup>⑦</sup>,而美国学派从本质上来说则是重商主义经济学的延续,因此,演化经济学与这些被西方主流经济思想史看作是异端的流派之间有着不解之缘,挪威著名演化经济学赖纳特追溯了它(他)们之间的联系(见图1)。<sup>⑧</sup>

图1 以知识和生产为基础的替代性教规经济学



实际上,赖纳特所研究的这种以知识和生产

- ① Witt, U., *Self-organisation and Economics — What Is New?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 1997, 8, pp. 489—507.
- ② Hodgson, G. M., “Darwinism in Economics: From Analogy to Ontology”, *Journal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2002, 6, pp. 259—281.
- ③ 贾根良:《达尔文主义与演化经济学:文献述评》,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04(2)。
- ④ 在很多时候,“National Economics”经常被翻译成国民经济学。但李斯特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首次被翻译成中文时,书名却是《国家经济学》,见李斯特:《国家经济学》,王开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27。为了与目前国内作为一门学科的国民经济学概念相区别,并突出体现作为其核心思想的国家利益,本文使用国家主义经济学的译法。
- ⑤ Freeman, Christopher (2004),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13—3, 541—569.
- ⑥ 贾根良、黄阳华:《德国历史学派再认识与中国经济学的自主创新》,载《南开学报》,2006(4)。
- ⑦ 贾根良:《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与大国崛起的经济学逻辑》,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0(3)。
- ⑧ [挪]赖纳特、贾根良主编:《穷国的国富论——演化发展经济学论文选》(上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但这个图并没有反映出演化经济学与李斯特之间的直接联系。

表1 1815—1914年间发展起来的  
三种主要的经济学说

李嘉图的自由市场理论	马克思主义	美国学派
假定所有的劳动力都具有相同的生产力。因此,人口密集的国家具有最低的工资水平。	工资是由“失业储备大军”所决定的供求理论。国家将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使用剩余劳动力。	高工资经济学说,生产率收益超过工资收益,从而使得高工资的劳动力在价格上低于“乞丐劳动力”。因此,利润和工资可以共同提高。更高的人口密度增加了生产率,因此提高了工资水平。工资水平的提高刺激了资本的替代,从而进一步提高了生产率。
土壤具有“原始的和不可毁灭的力量”。由人口增长导致的报酬递减迫使人类使用越来越贫瘠的土地。资本的应用不会影响土壤的相对肥力。	土地租金来自私有财产关系。社会主义将消灭私有财产制度,因此,也将消灭这种不劳而获的租金榨取。	土壤肥力是农业化学和资本应用的产物。随着人口增加和城乡之间循环流转的发展,农业综合企业享有报酬递增的收益。土地租金日益成为利润的一种形式。
资本主要被看作是一种成本,基本上表现为物化劳动(embodied labor)的形式。社会经济剩余的增长只表现为偶然的“外在性”。忽视资本的非成本方面,包括“社会资本”和公共投资。	资本最终是金融性的,它被用于雇佣劳动力进行商品生产,并在其生产的劳动力成本之上加上毛利进行出售。因此,资本总是使工资最小化。	资本的生产力在日益提高的程度上超过它的(劳动等)成本,这主要是由每个工人所能推动的能量的日益增长所导致的。这增加了社会的经济剩余,提高了工人的地位。
低工资国家比高工资国家具有贸易优势,但是,得自于贸易的收益在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平等地被分配。 对于阻止高人口密集度的工业化国家食品价格的上涨来说,外贸是必须的。否则,食品价格和土地租金的上涨将侵蚀利润。	外贸剥削了欠发达地区,虽然外贸是剥削性的,但由于导致了工业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它使得社会主义胜利的日子越来越迫近。	自由贸易导致了土壤肥力耗竭的耕作模式,并剥削了原材料出口国。为了推进工业资本和高工资的发展,保护性关税是必须的。 高工资的劳动力剥削低工资的劳动力,使高工资的经济垄断了外贸收益。
反对生产性收入(工资和利润)与非生产性收入(租金和利息)的经典区分。财富、资本和经济租金日益被忽视,越来越赞同以个人心理福利为基础的效用理论。“消费者是上帝”。政治和社会理论明显地越来越少。	日益成为一种怎样改变阻碍进步的社会政治制度理论。工业技术是上帝,导致最有效率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并具支配地位,但阶级矛盾决定着生产方式。	以资本理论为基础,发展出一种唯物主义史观,不断提高的生产率改变了生产和生活标准赖以发生的环境。 强调发展的非市场方面,逐渐发展为制度主义,但没有阶级矛盾或辩证的政治对抗。因此,倾向于一种朴素的关于收益的“生产率理论”。

为基础的替代性教规经济学就是在历史上比其他两种类型的经济学更加历史悠久的国家主义经济学,过去曾称作是民族主义经济学,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经济学,到目前为止,所有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追赶的发展中大无一例外地都遵循了这种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目前的西方经济思想史教科书丑化了重商主义经济学,删除了美国学派,而且还误解了李斯特经济学。以李斯特经济学为例,现在绝大多数人只知道李斯特的保护主义主张,而忽视了他关于产业、创新、金融、制度和发展等广泛的主题,但在笔者看来,李斯特在这些主题以及保护主义学说上无疑是演化和创新经济学的先驱。正如著名演化经济学家弗里曼指出的,李斯特最重要的贡献不是他的保护主义建议,而是关于政府建造基础设施和对“精神资本”投资的建议。亨德森也说,李斯特关心的是生产力发展及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保护主义不是他的核心主题;演化经济学家多西则宣称,李斯特阐述了资本积累、技术和学习能力、广泛的制度安排等如何共同决定了一国的长期国际地位,远非“幼稚产业论”能涵盖。<sup>①</sup>同样,无论是德国历史学派还是美国学派,它们都是在19世纪与李嘉图和马克思的经济学相并列的第三种经济学体系的不同表现形式,以美国学派为例,赫德森的研究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sup>②</sup>

但是,无论这种国家主义经济学的议题多么广泛,保护主义无疑是其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正如弗里曼在1983—1984年的论文中指出的,一国的国际竞争力不能用工率率、价格或汇率来解释,技术领先使一个国家具有绝对优势而不是比较优势,由于国际贸易的不均衡将持久存在,因此,对落后国家来说,自由贸易学说是适当的。但是,在随后的二十多年里,这种对自由贸易的批判性思路在国家创新体系的分析中几乎消失了,在后来的文献中这个问题也不再是关注的核心,演化经济学家们的焦点更多地集中在国内的制度组织和国家创新政策上,而很少关注技术对贸易的影响和贸易政策的作用。现在需要把这种思路重新带回来。<sup>③</sup>2007年,演化经济学家西莫里、多西、纳尔逊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在一篇论文中强调指出,汉密尔顿和李斯特的下述观点是正确的并将继续是正确的:成功的经济追赶

① P. Sai-wing Ho, “Distortions in the trade policy for development debate: A re-examination of Friedrich List”, Cambridge: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 29, 729—730.

② [美]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第17—18页,贾根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③ Bengt-Ake Lundvall(2004), “Introduction to ‘Technological infra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by Christopher Freeman”,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 13—3, 537.

需要某种类型的幼稚产业保护和其他形式的支持。<sup>①</sup>近年来,国家创新体系与欠发达经济之间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演化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我们希望演化经济学在保护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上能有所发展和创新。

但是,这样的历史重任应该更多地由中国经济学家所承担。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演化经济学在中国发展的首要任务不是学术,而是服务于国家崛起与共同富裕的统一目标。目前,与中国荣膺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宝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居于产业价值链低端、通货膨胀加剧、贫富差距日益拉大、资源与环境危机、创新乏力和居民实际收入的增长停滞不前正在使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挑战。笔者在最近的论文中,讨论了为什么中国目前的经济困境与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密切相关,<sup>②</sup>并提出要重新认识保护主义和内向型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新模式的重要意义。<sup>③</sup>很明显,与美国、德国和日本经济崛起时的国际环境相比较,落后国家经济追赶的难度大幅度增加了。例如,科学在经济追赶中的作用比从前更重要;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发展和国际分工中跨国公司的垄断结构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更困难;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不合理保护使

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活动更加艰难,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作出新的理论解释和对策研究,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的依据。历史经验及其教训告诫我们,作为一个追赶型的发展中大国,如果我们没有一种类似于美国学派和李斯特经济学的国家主义经济学作为经济政策的指导,我们是无法实现这一目标的。由于演化经济学在经济思想史上与国家主义经济学的深远渊源,因此,作为第三种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综合,创建中国的国家主义经济学就成了中国演化经济学家们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新经济思想史研究”(10XNJ015)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王胜强)

① Mario Cimoli, Giovanni Dosi, Richard Nelson and Joseph Stiglitz,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al Engineering in Developing Economies”, *www.globelics.org*, No. 2007(4).

② 贾根良:《国际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的致命弊端》,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6)。

③ 贾根良:《保护民族产业与内向型经济:中国崛起的唯一选择》,载《当代财经》,2010(12)。

## Evolutionary Economics: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Third System of Economics

Jia Genliang

**Abstract:** Whether it could maintain its independent research programme or not is currently the greatest challenge f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Tracing the source from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ctually belongs to the long-standing Western non-Marxist research tradition of heterodox economics. It is the third system of economics independent of western mainstream economics and Marxist economics. The common grounds of this theoretical system and the general support of the economic methodology of critical realism provide a broad basis for the integ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This integration aims not only to avoid its researchers confining to a narrow range of topics, but also to systematically construct a knowledge system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to overcome the current difficulties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its coordination with empirical studies, and other defects. There is a far-reaching origin between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nd National Economics long-standing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The integration of Evolutionary Economics with it has an object basis, and is designed to create a Chinese National Economics with the goal of the rise and common prosperity of nations.

**Key words:** Evolutionary Economic, the Third System of Economics, Western Heterodox Economics of non-Marxism, National Economics